

“竟陵版”《茶经》的善本形态与出版源流

童正祥¹, 张雅琴²

(1. 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 陆羽茶经研究中心, 湖北 天门 431700; 2. 天门职业学院, 湖北 天门 431700)

摘要:“竟陵版”《茶经》是明嘉靖二十一年所刻的最早的《茶经》单行本。对其仅存的北京国图本(柯乔本)、台湾“国图”本、北大本、杏雨书屋本的四种善本形态进行了比较,并结合其附刻对“竟陵版”《茶经》的出版源流进行了追溯:“柯乔本”为监察御史柯乔授意西塔寺刊刻并由鲁彭、童承叙承揽的官刻本;台湾“国图”本、北大本是续用了“柯乔本”原雕版的私人刻本;杏雨书屋本是“竟陵版”《茶经》的万历续刊本。鉴于“竟陵版”《茶经》的底本为“百川学海”丛书本中所录之《茶经》,将“柯乔本”和“百川本”中的《茶经》正文进行了比较,发现“柯乔本”刊刻同时参照过“百川本”中的“华理本”和“左圭本”两种版本。“竟陵版”《茶经》是历代《茶经》刊行的祖本,在《茶经》流变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关键词:竟陵版《茶经》;柯乔本;善本形态;出版源流;西塔寺;明嘉靖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12)03-0058-06

The Holy Book of Tea of Jinling version and its origin and advance

TONG Zheng-xiang¹, ZHANG Ya-qing²

(1. Lu Yu Research Association, Chinese Research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Tea Culture, Tianmen 431700, China;

2. Tianmen Technical College, Tianmen 431700, China)

Abstract: The Holy Book of Tea of Jinling version is the earliest separate edition of *Tea History* engraved in the 21st year during the reign of Jiajing.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structure and contents of the only three existing copies of Jiajing “Jinling version” of Lu Yu’s *Tea History* and its continued edition, and determine Keqiao version as the official engraved version, Wudan version as the continued edition, and clarify Jinling version’s editing, publishing process and the personne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meantime, the comparison makes clear the details of errata and augmented injection of Jinling version to Baichuan version. Thus, it confirms the tea sage hometown’s contribution on publishing the The Holy Book of Tea firstly in the publish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it compares Jinling version with several other major versions after Wan Li of Ming Dynasty, confirms Jinling version’s position in the tea history.

Key words: *Tea History* of Jinling version; Keqiao version; rare book; origin and advance of publishing; Xita temple; Jiajing period in Ming Dynasty

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 1542 年)在陆羽故居西塔寺刊刻的“柯乔本”《茶经》单行本问世,成为竟陵版《茶经》刊行的开始。这一版本对丛书本《百川学海》中所录《茶经》进行了仔细的勘校、注释,并扩充了本传、外集等内容,形成了新的《茶经》版本系统,并因其“陆羽故里”的地缘文化优势成为《茶经》版本系统中辐散寰宇的主导性影响源。因该版本的存世形貌至今得窥者甚少,致使其历史

影响湮灭不闻于今。笔者试对明嘉靖“竟陵版”《茶经》存书的四种善本形态进行研究,并对其附刻和《茶经》正文进行分析解读,以期复现明嘉靖“竟陵版”《茶经》的出版风貌与历史影响。

一、“竟陵版”《茶经》的四种善本形态

据现有的资料看,明嘉靖“竟陵版”《茶经》仅存 4 种善本,分别藏于 4 个地方。按收藏单位的图书编目分别为:

(1) 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二年柯□刻本”,也称“嘉靖壬寅柯双华竟陵刻本”或“嘉靖竟陵本”。(经核查,该编目中的“二十二”,是

收稿日期: 2012 - 03 - 07

作者简介:童正祥(1945—),男,天门市竟陵人,副主任医师,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陆羽茶经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天门市陆羽研究会副会长。

将鲁彭序隶书“嘉靖式十年岁在壬寅”中的大写“弋”当作了“二”字，而空格“□”当为“乔”)下文称“北京国图本”或“柯乔本”。

(2) 台湾“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1542年)新安吴旦刊本”。下文称“台湾‘国图’本”。

(3)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刻本”(一函二册)，简称“北大本”。

(4) 日本杏雨书屋藏“嘉靖竟陵本茶经”，又称“竟陵版续刻本”或“杏雨书屋本”。

以上四个善本的印刷版式完全一致，均为九行二十字，白口左右双边。版框规格 18.5×13.1cm 左右。但其篇目装订顺序有区别(表 1)：

表 1 明嘉靖竟陵版《茶经》四种存世善本的装订顺序

篇目 (按页面中缝题词)	页面 数	北京 国图本	台湾 “国图”本	北大本 (上下册)	杏雨 书屋本
刻茶经序	10	1	0	0	1
茶经序	6	2	1	1	5
茶中杂咏序	6	3	2	2	6
茶经卷上、中、下	54	4	3	4	2
茶经外集	16	5	5	5	4
茶经本传	10	6	4	3	3
刻茶经跋	2	7	6	6	7
刻茶经后序	8	8	0	0	8

注：以“北京国图本”为标本比较，栏中数字为装订顺序；“日本杏雨书屋本”之《茶经外集》有 19 个页面。

以上 4 种善本的内容与装订方面的区别是：

(1) “北京国图本”，一册 56 页(印板)。内容依次为：《刻茶经序》(鲁彭)；《茶经序》(陈师道)；《茶中杂咏序》(皮日休)；《茶经卷上》；《茶经卷中》；《茶经卷下》；《茶经本传》(《陆羽传》、以下简称《赞》的《童史氏承叙曰》、《水辩》、《大明水记》、《浮槎山水记》)；《茶经外集》(包括唐诗 5 首、宋诗 1 首、明诗 19 首、《童内方与梦野论茶经书》)，《刻茶经跋》(吴旦)；《刻茶经后序》(汪可立)。

(2) “台湾‘国图’本”，一册，47 页(印板)。该本与北京国图本的区别，一是没有鲁彭《刻茶经序》与汪可立《刻茶经后序》，二是将《茶经本传》排在《茶经外集》的前面。

(3) “北大本”，一函二册，47 页(印板)。上册为《茶经序》；《茶中杂咏序》；《茶经本传》，《茶经

卷上》；《茶经卷中》。下册为《茶经卷下》；《茶经外集》；《刻茶经跋》。与“台湾‘国图’本”对照，印刷所用刻板完全一样，只是装订顺序有别，“北大本”将《茶经本传》篇放在《茶经》正文前面。

(4) “杏雨书屋本”，一册，59 页(印板)。与“北京国图本”结构的区别，一是将原放在鲁彭《刻茶经序》后的《茶经序》和《茶中杂咏序》移到了《茶经外集》之后；二是将《茶经外集》中的《童内方与梦野论茶经书》放在了《茶中杂咏序》的后面；三是将原《茶经外集》的第 6 页减去，另新增 4 页，内容为明代诗 17 首(包括原结尾页上的 2 首重新录入)，从而使“外集”中的明诗增加到 34 首。诗的内容亦全部与陆羽故居西塔(龙盖)寺有关。另外，原“外集”后面的“晚生柳东谨录”字样已不复存在。证明新增页为补刻。

在比对“台湾‘国图’本”和“北大本”的字迹墨痕，甚至板框线细部损坏情况后，可以确定两者都与“北京国图本”为同一刻板所印刷。

至于“杏雨书屋本”，布目潮沅先生根据新增诗中收有隆庆二年(1568年)任分巡荆西道之方新的诗、隆庆八年任同一官职之余一龙的诗，还有万历十三年(1585年)任同一官职之苏雨的两首诗，以及万历贡生江有元、延鹤的诗等，断定“嘉靖竟陵本《茶经》(1542年刊本)和此《茶经外集》，不是同时刊行的。杏雨书屋藏的嘉靖竟陵本《茶经》内之《茶经外集》当属后世附刊；或者杏雨书屋藏本为嘉靖竟陵本之补刊修订本，其刊行日期，当不晚于万历十三年以后。对于这一点，据嘉靖竟陵本之《茶经》原文第二页之补刻字样和《茶经外集》字体十分相似，可以推断。”^[1]笔者亦据此进行了仔细核对，通过比对“柯乔本”与“杏雨书屋本”全部序、跋印刷文字，二者字体完全一致。特别是鲁彭序后的二枚刻章，可以视为同板印刷的铁证。只是“杏雨本”部分字迹和框线的印刷有许多模糊甚至漏印之处，由此可以推测这部分内容是续用了“柯乔本”的原雕板。究其原因，这几篇序文字体较大，经多次印刷也难以损坏，故可供后人续印。但从茶经正文来看，显然为重刻版。明显之处为：第一面上第二行上的“竟陵”，为“竟林”，不象是因刻板字损坏所致；第二页最后一行第八个字，原文为“采”，刻

成了“迷”；《七之事》第六面最后一行上面的“卓”刻为“十”。而《茶经》卷上最后一页，“北京国图本”、“台湾‘国图’本”、“北大本”的“茶经卷上”四字排在空白面的最后，而“杏雨本”排在有字面上。另外，“杏雨书屋本”中的《茶经本传》和《茶经外集》的字体和“北京国图本”也有明显区别，显示此部分也为重新刻板。

二、“竟陵版”《茶经》的附刻解读

“竟陵本是现存最早的单行本《茶经》，其于《茶经》本文之外，附刻甚多。”^[3]所谓附刻，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序，二是“传”，三是“记”，四是“外集”。“竟陵版”《茶经》除了有“刻茶经序”及“后序”之外，辑录有包括唐诗5首、宋诗1首、明诗19首、《童内方与梦野论茶经书》在内的《茶经外集》，还第一次录入陈师道序以及附皮日休《茶中杂咏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茶经本传》，其中辑录的《陆羽传》是童承叙修改了的，《赞》也是童承叙首撰。通过对这些附刻的解读，可以从中大致得出“竟陵版”《茶经》的出版源流和风貌。

鲁彭^①《刻茶经序》曰：“粤昔己亥，上南狩郢置荆西道，……监察御史青阳柯公，来莅厥职。越明年……索羽所著《茶经》三篇，僧真清者业录而谋梓也，献焉。……遂命刻诸寺。”“夫茶之为经，要矣。行于世脍炙千古，乃今见之《百川学海》集中，兹复刻者便览耳。”“又且见于张、欧《浮槎》等记，则并附之”；“嘉靖二十一年岁在壬寅重九日”。从上文可知，1540年柯乔曾命龙盖寺刻《茶经》，此时，僧真清已将《茶经》抄录好了。序者也曾曾在《百川学海》中见过《茶经》，并说应该附录张又新与欧阳修的“水记”，时间为农历壬寅(1542)年九月九日。

《童内方与梦野论<茶经>书》^②曰：“十二日承叙再拜”，“《茶经》刻良佳，尊序尤典覈”，“唐皮公日休、宋陈公师道俱有序，兹令儿子抄奉，若再刻之于前亦足重此书……不必己出叙……暇日令人持纸来印百余部”。从童《书》可知：一，这封信写于同年九月十二日，在见过刻成的《茶经》板，以及梦野(鲁彭)九月九日的《刻茶经序》之后；二，鲁彭曾邀童写序，而童认为鲁序很好，勿需另

写，并推荐将陈、皮二人的序放在前面，并由儿子抄录，连同《书》信一并交给了鲁彭。

对比《新唐书·陆羽传》文字，该版《茶经本传》中所收录的《陆羽传》较前者比，计增30字，减4字。一是将“或言有僧得诸水滨畜之”文中删去了“得诸水滨”，并在“畜之”前增加了“晨起闻湖傍群雁喧集以翼覆一婴儿遂收”17字，二是在“上元初更隐苕溪自称桑苎翁”后增加了“又号竟陵子东园先生东冈子”12字。《传》文之后，《水辩》之前，还录入了“童史氏承叙曰”《赞》文，计116字。笔者查阅童承叙此前主编《沔阳州志》，所收《传》文及《赞》文，亦与录入“竟陵版”陆羽茶经中的完全相同，由此推测，编入《陆羽传》、《赞》也是童内方(承叙)所为。

汪可立^③《刻茶经后序》曰：“侍御青阳柯公双华莅荆西道之三年……至景陵之西禅寺，问陆羽《茶经》，时僧真清类写成册，以进属校求于余”；“今经既寿诸梓，又得儒先之论，名史之赞，群哲之声诗汇集……嘉靖壬寅冬十月朔祁邑芝山汪可立书。”这篇写于同年农历十月初一的后序说明，监察御史柯双华两年前见过真清“类写成册”的《茶经》，曾嘱汪进一步校对。而此时《茶经》正文已由鲁彭刻完，还有序文，以及童承叙编撰的《陆羽传》与《赞》，和《茶经外集》，因此《后序》可理解为“编审手记”。

吴旦^④《刻茶经跋》曰：“予闻陆羽著茶经……客景陵^⑤于龙盖寺僧真清处见之……欲刻之而力未逮”；“乃率同志程子伯容，共寿诸梓”；“嘉靖壬寅一阳月望日”。说明上文写于《茶经》刻完后的农历十月十五日。他也在僧真清处见过《茶经》，因无力自刻，就和程子伯一道共用了鲁彭的刻板进行刷印。可能因为“客竟陵”时间有限，借《茶经》及相关文本的印板时，鲁彭序和汪可立后序尚没刻成，亦或其它原因而没用此二序，故造成了今天人们所见之明嘉靖“竟陵版”《茶经》之“台湾‘国图’本”以及“北大本”二序的缺失。而在装订时，由不同的人分别按自己的理解来排序，从而使同一时期、同一刻板拓印出的纸张，装订出了两种版本，即台湾“国图”藏的一册本和“北大”藏的二册本。

三、《茶经》“柯乔本”与“百川本”的文本比较

明嘉靖“竟陵版”《茶经》中“柯乔本”的底本为“百川学海”丛书本中所录之《茶经》。这一点鲁彭《刻茶经序》说得很清楚：“今见之《百川学海》集中，兹复刻者，便览尔。”而在当时可能见到的《百川学海》版本有两种，即南宋咸淳(1273年)“左圭本”，明弘治(1501年)“华理本”。为弄清这两种版本与“柯乔本”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者对“柯乔本”与《百川学海》本《茶经》进行了细致比较。

(1) 勘误与刊误。将“柯乔本”《茶经》文字与“百川本”比较，“柯乔本”改动文字32处共35字。计：《一之源》3处3字，《二之具》1处1字，《三之造》1处1字，《四之器》8处9字，《五之煮》2处2字，《七之事》12处12字，《八之出》4处6字，《九之略》1处1字。其目的，当属勘误。如对物名的更正，《一之源》注文中“藏葵”改为“蒲葵”；对人名的更正，如《七之事》中“江洗马充”改为“江洗马统”；“青山”改为“黄山”；有对年号的更正，如《七之事》中“永嘉”改为“元嘉”；有对地名的更正，如《八之出》第一段释文中“南郑县”改“南郢县”等，这些改动都有经典可据。

改动大多是对刻刊误字的校正，如“茶振”改“茶根”，“至叶”改“茎叶”，“固眼”改“圆眼”；改“去而言”为“啞而言”，改“王皇”为“三皇”等。当然也有个别地方为编者的理解问题，值得商榷。如《二之具》，“簏”的注文中，为“受四升”，“柯乔本”改为“容四升”，其含义似乎相同。

“柯乔本”的刊误，明显错字有4处。一是《一之源》第二段原注“开元文字音义”为书名，“柯乔本”将“音”字刊为了“者”字；二是《四之器》“碗”，文中“受半升”刊为“受半斤”；三是将《七之事》中的“吴兴太守”刊为“吴兴太子”；四是将“过江”刊为“过汪”。

(2) 文字增减。“百川本”《茶经》正文(不含注释)总字数为6339，“柯乔本”为6342个字。其中，属“编目”的文字，前者107，后者103，原因是“茶经卷中”卷首页中，“柯乔本”将“四之器”三字重

复排了二行，“茶经卷下”末页最后，“柯乔本”比“百川本”多了一个“终”字。其它正文数字，前者为6236，后者为6235个字，虽总数只差一个字，但实际上“柯乔本”较之“百川本”增加了三个字，删(漏)了四个字。增字为：《二之具》中“上八十斤”后补了一个“穿”；《七之事》中“任育”后补了一个“长”，“为热为冷”后加了一个“耳”。减字有四处，即：《四之器》“碾”文中“三寸八分”的“八”字；“则”文中后面的二个“之”字；《七之事》中“久服令人”中的“令”等4字。这其中“八”字显然为漏刊。

(3) 新增注释。“百川本”《茶经》有原注46处，文字506个，“柯乔本”比“百川本”新增加了注释12条100字。为区别旧注，它在每条释文前专门加了一个“○”符号(下文从略)，计：《一之源》1处：“栝当从石为砾”；《二之具》2处：“亚作榧木枝榧也”、“筲音崩篲音郎筲篲篮笼也”；《三之造》1处：“犁音朋野牛也”；《四之造》3处：“檀古箱字”，“音胄木名也”，“合即今之盒字”；《六之饮》1处：“俞当作渝”；《七之事》4处：“育长任瞻字元本遗长字今增之”，“溃当作溃”，“下饮谓设茶也”，“悬车喻日入之候指人垂老时也淮南子曰日至悲泉爱息其马亦此意也”。

(4) 版式的变化。“柯乔本”的刻板格式基本沿袭了“百川本”。虽然“柯乔本”改“百川本”12行为9行，但每行仍为20字，版式风格二者相同。如首页前几行文字排列完全一样；“茶经卷中”与“茶经卷下”的开篇均另起页等等。其不同之处仅有三点：一是《七之事》中改排了二段文字，即将原列在“艺术传”段中的“释道该说续名僧传”，以及列在“梁刘孝绰”段后“陶弘景杂录”二段文字另为起头，以示其故事各自的独立性；二是将《七之事》最后一条“孺子方”中原来用小字横排的“苦茶”改为大字直排，恢复了原文的本意；三是将《八之出》中原单独起头的“淮南以光州”文与前面的“山南”段文字连排，保持了全篇文字风格的一致。

特别有趣的是，比对两者的三处刻板上的空字块和墨丁，竟然如出一辙：“百川本”《七之事》“傅咸司”段中“打破其器具”与“又卖饼”之间留有一字空白；《八之出》中“湖州上”注文中，“白茅

山”前面为一墨丁；《九之略》中第二行文字第四字后也为一墨丁，而“柯乔本”的这三处亦分别处理为墨丁、空格、黑丁。其实，原刻板上的这种处理显然是对书稿缺字或原文不清字的处理，而再刻版的这种“依样画葫芦”恰恰证明了忠于原版的态度，(对比明代其它版《茶经》，唯有华理刊“百川学海壬集本”刻本与之相似，这三处亦分别为空格、

空格和墨丁。

布目潮汛先生认为，“嘉靖竟陵本”(即“柯乔本”)所用之“百川本”为“华氏本”^[2]，但对比“柯乔本”与“华理本”和“左圭本”的文字区别，笔者认为“柯乔本”刊刻时可能同时参照过两种“百川本”(表2)。

表2 左圭本、华理本文字的区别及与柯乔本比较

范围和页面	左圭本	华理本	柯乔本
茶经卷首第八行	注文“周公云價”“执戟”	“周公云價……执戟”	同左本
茶经卷上第九行	注文“开元文字音义”	“开元文字者义”	同华本
茶经卷上二之具	“穿”文中“一百二十斤为上”	“一百二十斤为上穿”	同左本
茶经卷上尾空白页	仅第4行有“茶经卷上”4字	无空白页	同华本
茶经卷上三之造	第十行“荷者至葉”	“荷者莖葉”	同华本
茶经卷中四之器	“碾”下有“拂末”	无“拂末”二字	同左本
	“夾”文最后“取其久也”	无“久”字	同左本
	“碾”文第一行“桐柘为臼”	“桐柘为臼”	桐柘为之
	“甞籩”下有“捣”字	无“捣”字	同左本
茶经卷下五之煮	正文4行下“茶罷热揭”	“茶罷热揭” ^[1]	同左本
	30行注文“至美者曰隽永”	“至美者西西隽永”	同左本
茶经卷下七之事	第4行“孟阳传司”	“孟阳傳司”	同左本
七之事“本草菜部”	“神異记……曰予舟丘子”	“曰工舟丘子”	同左本
	“傳咸司”中“打破其器具”后留有一字空格	与左同 ^[2]	空字处为“墨丁”
	“青山君”	“黃山君”	“黃山君”
	“今茶一名茶……谁谓茶苦……堇茶如始	三个“茶”字均刻为“茶”字	前后二“茶”改为“茶”，中间“苦茶”仍同左本
茶经卷下八之出	“湖洲上”注文中“生山桑儒师二”后为墨丁	墨丁处改为空白 ^[3]	同华本
	“淮南以……”为另起头	连接上文排	同华本

四、考证结果与讨论

(1) 明嘉靖壬寅“竟陵版”《茶经》是指经由鲁彭所刻之版而刊印的《茶经》。鲁彭在该版《茶经》中的“主编者”与“勘刻者”地位在稍后的李维桢^⑥《陆羽祠记》中也得到印证：“嘉靖间邑人鲁孝廉刻《茶经》，惟沔阳童庶子《传》附之。”“柯乔本”、“吴旦本”(台湾与北大藏)和“杏雨书屋本”都是该版的成书形态。另外，鲁彭在勘刻《茶经》的过程中，参照了“百川本”中《茶经》的版式和内容。

(2) “柯乔本”是官刻本。“柯乔本”是在荆西道监察御史柯乔(双华)“观风竟陵”时，作为彰显当地风物、进行人文教化的一项政绩而授意西塔寺刊刻的。承揽此事的鲁彭、童承叙二位也为官员。而印数过百，在当时也是不小的规模了。由此认定

该本为官刻本当不为过，被人称为“柯乔本”也在情理之中了。

(3) “台湾‘国图’本”以及“北大本”为明嘉靖“竟陵版”的私人印本。虽然“台湾‘国图’本”又名“吴旦本”，其实吴旦“欲刻之而力未逮”，而只是“共寿诸梓”罢了。该本没有收录鲁彭《刻茶经序》与汪可立《茶经后序》。可能原因一是想自别于“柯乔本”，二是刷印时没等(借)到这两件刻板。而且，在装订时也不像官刻本那样严格，故出现了台湾“国图”本和“北大本”用板相同而装订不一的情况。

“吴旦本”与“柯乔本”属于两拨互不相涉的刊行本，唯一的交集是僧真清。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为什么“柯乔本”中收录有吴旦的跋？可能的情形是“柯乔本”在“刊印百余部”的时间为农

历十月底,甚至更迟。而吴旦因为客居不能久留,见到《茶经》及《外集》、《本集》等刻板,即于农历十月十五加写了跋板,自己印刷了部分书册而先带走,并将《跋》板留在了西塔寺。

(4) 西塔寺是明嘉靖“竟陵版”《茶经》校勘、刊印、传播与藏版的中心。全套刻板曾长期保存于西塔寺内。“杏雨书屋本”为“竟陵本续刻本”,准确的说是“竟陵版万历续刊本”,因为它大约成书于1588年左右。该善本大部分使用了原刻板,但字迹清晰程度显然不如“柯乔本”。这说明“竟陵版”《茶经》的原板,问世几十年后仍存在于西塔寺内,这样才方便后人借用。

(5) 明嘉靖“竟陵版”《茶经》的初录者为僧真清,审订者是汪可立。“鲁序”和“吴跋”说明,《茶经》三卷刻本抄稿是由僧真清提供的,而《茶经外集》所收入的题西塔寺诗,也只有寺院主持才具有汇集成册的便利条件。汪可立后序“今经既寿诸梓,又得儒先之论、名史之赞、群哲之声诗汇集”,则概述了汪可立自己见到鲁彭刻的《茶经》印板、以及《刻茶经序》,还有童承叙写的《赞》文以及《茶经外集》,并为之校订的过程。

(6) 明嘉靖“竟陵版”《茶经》在《茶经》流变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为“百川本”的文字增补了注释,并做了大量的勘误。虽然它自身仍存在些许刊误,但瑕不掩瑜。因此,布目潮汎先生认为嘉靖竟陵本“成为万历时期《茶经》普及刊行之先导”。^[1]“明嘉靖二十一年以后,天门屡次出版《茶经》单行本,成为《茶经》普及中心。”^[2]

“竟陵本的附刻行为影响了明代大部分的《茶经》的刻印,特别是万历间的近十种版本。”^[3]明万历十六年(1588)秋水斋本《茶经》王寅的序文是凭证之一:“《茶经》失而不传久矣,幸而羽之龙盖寺尚有遗经焉,乃寺僧真清所手录也。”说明其祖本源自“竟陵版”。“竟陵本的另一重大影响,是对《茶经》文字的校订,其后的绝大部分明代刻本都有内容一致、形式文字稍异的校订,此风一直影响到清

代的某些版本,如陆廷灿《续茶经》首附“原本茶经”即是一例”。^[3]笔者将明胡文煊本、汪士贤本、郑燮本以及玉茗堂本与明嘉靖“竟陵版”之柯乔本进行了逐字比对,结果发现,柯乔本所增注的内容,这些版本均已照搬,而文字改动方面也基本相同,包括柯乔本自身所发生的部分错误。

总之,陆羽故居西塔寺以其特有的地缘文化优势成为《茶经》倡导、校勘、研究、刻版、存版,乃至文人交往,官绅借以进行人文教化的中心与“茶经”文化的“圣地”。“竟陵版”《茶经》的问世不仅形成了新的《茶经》版本系统,也使茶圣故里的《茶经》文化形态之影响辐散寰宇内外。

注 释:

- ① 鲁彭,字寿卿,号梦野,(?—1563)景陵人,正德丙子(1516)以乡荐就选京师,后授乐会县令。御任后居景陵东湖莲北庄即其父鲁铎别墅。
- ② 童内方,即童承叙。明正德十五年(1520)进士,曾任国子司业,兼翰林院侍讲(嘉靖帝老师)。嘉靖二十一年归籍沔州。
- ③ 汪可立,缺生平资源。《明史艺文志》中载其著有《九华山志》二卷。
- ④ 吴旦,字启东,新安休宁人,生平不详。嘉靖七年(1528)进士,曾任广西庆远府同知。
- ⑤ 景陵,唐复州竟陵郡于五代后晋天福元年(公元936)改“竟陵”为“景陵”,因此,明代时,实为景陵。但后人仍习惯称谓“竟陵”。
- ⑥ 李维楨(1547—1626),字本宁,京山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累官礼部尚书。

参考文献:

- [1] 布目潮汎. 杏雨书屋藏明嘉靖竟陵本茶经之有关问题——日本刻茶经之谱系[J]. 陆羽研究辑刊, 1988(5): 172.
- [2] 布目潮汎. 日本<茶经>之普及与天门市之关系[J]. 陆羽研究辑刊, 1988(5): 13.
- [3] 沈冬梅. 茶经校注[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责任编辑: 曾凡盛